

对“知行合一”思想的三点认识

——《传习录》研读体会

□ 吴昊昱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到“知行合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广大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在常学常新中加强理论修养，在真学真信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学思践悟中牢记初心使命，在细照笃行中不断修炼自我，在知行合一中主动担当作为。关于知和行的关系，他指出，“‘知’是基础、是前提，‘行’是重点、是关键，必须以‘知’促‘行’、以‘行’促‘知’，做到知行合一”，“我国古人关于知行合一的论述，强调的也是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他还强调，思政课教师要自觉做到修身修为，像曾子那样“吾日三省吾身”，像王阳明那样“诚意正心”“知行合一”，自觉做学为人的表率，做让学生喜爱的人。

在中国传统哲学领域，知行观，即认识与实践的关系是基本问题之一。早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中国古代先哲们就开始对知行的辩证关系做过初步探讨，如《尚书》提到“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左传》提到“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到了明代，王阳明首次系统论证了“知行合一”的思想，在儒家思想史上引起广泛的争论，对后世影响深远。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记载他与弟子门人交游问学的往来语录《传习录》中。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把握中国古代知行观的实质内容，本文对《传习录》中阐发的“知行合一”思想进行再探讨。

“知行”的层次问题

一般而言，知为认知，行为实践。但是细读《传习录》会发现，“知行”的主体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三个层次，“心之知行”“意之知行”“身之知行”。“心”可理解为本心，“意”可理解为意识，“身”则是身体。关于“心之知行”，王阳明提出“自己心地良知良能”。一方面，“心之虚灵明觉，即所谓本然之良知”，所以，“心”所具有的“知”即是“良知”；另一方面，“夫人心本神，

本自变动周流，本能开物成务”，所以，“心”还具有生成万物之动能，是“不学而能”之“良能”。因此，在王阳明心学中，“心”之知为“良知”，“心”之行为“良能”。

关于“意之知行”，《传习录》中写道：“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意识、意念基本上属于知的范畴，但是在王阳明这里，意识不仅有“知”的属性，还有“行”的属性，因为意识可以触发行动。“知食乃食”的例子就充分说明了意识如何触发行动。人只有“欲食”的意识，才有主动去“食”的行动，“夫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后知食。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因此，没有意识，行动便没有动力。所以“意”之知是意识的感知，“意”之行是意识的触发，并表现为行动。

最后，“身之知行”。与“心”“意”相比，身体是由具体物质构成的客观实物，人之耳目四肢一方面可以感知外界刺激，此即“身”之知；另一方面，“身”还可以在感知刺激之后作出相应的举动，此即“身”之行。正如《传习录》中所言：“汝心之视，发窍于目；汝心之听，发窍于耳；汝心之言，发窍于口；汝心之动，发窍于四肢。”

“心”“意”“身”虽然都具有“知行”两相维度，但是其地位却是不同的。“心”之“知行”是首要，如《传习录》中所说：“若是知行本体，即是良知良能”。意识、身体的“知行”都是依赖于本心的“知行”。

“知行”的顺序问题

《传习录》中记载了王阳明与其弟子徐爱的一段对话，王阳明说道：“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依据字面意思，认知是行动的开始，行动是认知的完成，似乎先有知，而后才有行，故知行有时间先后之分。然而，王阳明说完此话之后紧接着又说道：“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其实，“知行”是一体两面，并

不存在顺序上的先后之分。“知”即包含“行”，“行”亦包含“知”。没有“行”的“知”不是王阳明心学的“知”，没有“知”的“行”亦不是王阳明心学的“行”，“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

在与弟子徐爱的对话中，王阳明还以反面案例说明知行的合一性。“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维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摸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传习录》反复强调的是，“知”和“行”不是两件先后分离的事，而是一件事的两个向度。

此外，为了说明知行的合一性，《传习录》中还有一些以“孝悌”“痛”“寒”“饥”为例，说明“知行”不可分割的言论。“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知孝弟。”又比如如何知痛知寒知饥，“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可以看出，要有知，必有行在其中。因此，王阳明才断定，“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

“知行”的良知良能问题

良知良能是“知行”的本体。意识的认知与身体的感知都是基于本心之“良知”，意识的发动与身体的举动都是基于本心之“良能”。在《传习录》中，“知行合一”不仅强调“知”和“行”本身，更强调“知行”的良善属性，应以良知良能引导“知行”。

“知行合一”的“知”不是一般

意义上的“知”，而是“良知”。王阳明认为，“知识”与“心之本体”之间存在着两种可能：一种是不离心的知识，“此心在物则为理”，以本心去求事物之理，可以达到“知行合一”；一种是失却心的知识，“外心以求理”，外于本心去求理，“知行”则会分离。以外心求理，可使“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换言之，如果没有良知导引，知识的增长不但不能用于良善之目标，反而会使人心沉溺于私欲，乃至泯灭天理。因此，私欲的存在会使“知行”与良知良能分割开，“都是一个私心，便不当理”，从而无法达致“知行合一”。

由此，“知行合一”的根本目的在于良知良能的实践。“知良能，是良知；能良知，是良能。此知行合一之本旨也。”当然，“知行合一”并不意味着排斥知识，而是强调其良善之导引，“为学须有本原，须从本原上用力”。

知行问题是中国哲学的根本问题之一。“知行合一”思想丰富了传统文化中对认识与实践关系的理论探讨，对我国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最出色的哲学著作之一《实践论》，其副标题即为“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这表明，在“中国化”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鲜明的“实践”特色与中国传统哲学“知行合一”的本质特征融合起来。因此，深刻理解“知行合一”，亦将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讲师〕

青年教师基本文献研读

爱上一座山

□ 施崇伟

“不登王莽岭，岂识太行山。天下奇峰聚，何须五岳攀。”牟于陡峭山间的巨石上，刻画着笔走龙蛇的题诗。我和朋友驾着越野车，穿行在山谷间，亲眼所见这狂飙般的行书刻字，心情很是振奋。神往已久八百里太行，终于抵达。

到了山之巅，不由分说，舍车马。站在清风亮日、绿意盎然的高处，环顾四野，奇峰怪石，莽莽苍苍。秀丽风光入眼来，顿觉神清气爽，心扉豁然，一些久积于心的烦恼和困惑瞬间如拨云雾，无影无踪。素有“太行至尊”美誉的王莽岭似从天而降，岂不乐哉？

早闻风景独好，故事迷人。兴奋地迈开腿，沿着山石铺成的小路，走向满目绿色的林中。群山峰嵘，一座连着一座，连绵不绝；石柱奇峰，一根接着一根，直逼云天；陡岩峭壁，一面连着一面，像一幅天然画布；深邃沟壑，一个接着一个，纵横交错。一路上，有风吹来，松涛阵阵，此起彼伏，如奏乐章；有鸟啼鸣，清脆悦耳，像致辞远客。这远不及边深不见底的崇山中，藏匿着众多珍稀与神秘。

奇峰汇聚的王莽岭地势险要，为历代兵家争夺之地。巨崖“刘秀跳”便是其险中之险、谜中之谜。这里流传着王莽与刘秀争斗的故事，“王莽岭”之名就来源于此。行到此处，一行人不禁驻足环视。崖前劲风萧萧，仿佛时光回到了2000年前的古战场。

西汉末年，政局动荡，王莽称帝，建立新朝。民间传说有一次刘秀深夜带兵到王莽军营刺探军情，不料被王莽将士发现并尾追至此。前有悬崖深峡，后有紧追追兵，情急之下，刘秀纵身一跃，投身万丈崖谷。王莽的将士则无人敢跳，而刘秀绝处逢生，安然无恙地得以逃脱。当地人戏称，“刘秀一跳”，跳出汉朝200年的江山。

离开险绝之境，我和朋友们又来到另一段奇绝之路——挂壁公路。车子在悬崖峭壁上的公路蜿蜒而行，有一大半车程是穿山而过。汽车钻进低矮狭窄的山洞，透过车窗，车灯映出隧洞内的坚硬青石，以及炸药和凿子留下的清晰痕迹和纹理。从20世纪60年代起，几代太行山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历经30多年奋战在王莽岭绝壁上凿出这条七八公里长的公路。靠绝壁一侧，是从山腹里掘出的一道道洞口。向外远观，但见峡谷旷古雄壮，田亩麦苗青青。我们坐在车里，紧张得屏住呼吸。盘旋至谷底，回望隐藏在太行山深处的挂壁公路，简直是在绝壁上构建的人间奇迹——挂壁公路的一端，隐秘着原始的美景；挂壁公路的背后，王莽岭山民用生命和鲜血铸就了感人魂魄的奋斗精神！

巍巍太行山，雄伟、险峻；茫茫王莽岭，浑厚、秀美。一方水土一方人。战争年代，山里人送子参加抗

日，吹响嘹亮军号；和平时时期，庄稼人用双手在绝壁“抠”出通途，换了人间。

傍晚，结束了一天的行程，我们来到大山脚下的一座小村里住宿。客店主人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向我们自豪地介绍王莽岭的风景、故事。鲜花在院子里开放，房间干净整洁，好有宾至如归之感。主人安顿好了我们一行，就扎进厨房，忙着准备晚餐。开饭了，圆桌飘香，地皮菜炒土鸡蛋、农家木耳小炒肉、杏仁野菜、蒜香灰灰菜、山蘑菇炒肉，最隆重的是桌子中央那盆黄澄澄的土鸡汤。主人还端出自家酿的酒，与我们一起共饮，聊如今家里和乡亲们生活的新变化。我们同行中的“诗人”不禁举杯吟哦：“太行巍峨万仞峰，云霞缥缈有无中。犹听陵川号声厉，军旗红！戏说当年王莽事，更喜新村振兴功。醉里再倾三碗酒，很斜松。”在这样的山水人家，不饮已醉。

要说再见，心里却是不舍的留恋。我把《在太行山上》情不自禁地歌唱，向着古神话传说《愚公移山》重现于挂壁上的公路回望，对民风淳朴新农村的幢幢新舍、青青麦苗投以深情的目光。

我忽然发觉，我已深深地爱上这座山！



图书馆具有保存人类文化遗产、开发信息资源、参与社会教育等职能。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很早就认识到图书馆在人类社会进步中的意义和作用，并为图书馆的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例如李大钊，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还被誉为中国现代大学图书馆的奠基者、出色的大学图书馆领导者。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期间，在现代图书馆学研究、图书馆制度建设、图书馆功能开发等方面都有鲜明的见解和显著的成就。那么，李大钊是如何做好图书馆工作的呢？

提高自身业务工作能力的

图书馆是一个信息和知识高度密集的场所，一座图书馆的运转，背后需要有理论、技术、方法的支撑。李大钊是一个对工作和事业极端负责任的人，自进入北大图书馆工作后，他十分清楚地知道，如果缺乏专业知识，仅凭满腔热情是办不好图书馆的，所以他十分注意吸取国内外图书馆管理的先进经验和理念。在他刚接手北大图书馆工作之初，就很快参观访问了清华学校图书馆，及时引进一些先进理念和管理方法，并在实践中取得了明显效果。同时他积极和在国外的一些学者联系，请他们介绍国外一些图书馆的管理状况。另外还注意从书本上学习，了解掌握了诸如美国、日本等许多国外图书馆的情况。由于他能够及时、虚心、广泛地学习国内外办馆经验，刻苦钻研图书馆学，从而能迅速地对图书馆事业有了深刻的认识，又通过实践体会总结升华成自己的研究成果。他先后发表了《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二周年纪念会演说辞》《关于图书馆的研究》等一系列图书馆学方面的论文，成为最早从理论上对我国图书馆，尤其是学

重视对馆员培养培训

更好地发挥图书馆的职能，需要有受过专业教育的图书馆员。因此，如何获得合格的馆员，成为做好图书管理工作的关键，这也是国际范围内普遍设置图书馆学学科的原因。通过研究，李大钊发现美国在1903年时就有十几所师范学校开设图书馆学知识的相关训练，这一点十分适合当时的中国教育界引进。1921年12月，他在《晨报》上发表《美国图书馆员之训练》一文，介绍了美国17所图书馆学校的沿革、学制、课程等方面的情况，又结合国内当时的状况，及时地提出了培养和训练图书馆专业人员的问题。李大钊希望国人能够吸取借鉴国外图书馆员训练方面的先进经验，及时改变观念和现状，为较为广泛地开展独立的图书馆学教育事业创造条件，培养出具备条件的、合格的、具有时代精神的馆员，以便加快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健康发展。李大钊明确指出，提高图书馆工作质量、发展图书馆事业，关键是要发展图书馆学教育，要在高等师范兴办、添设图书馆专科或简易传习所，使管理图书的都

有图书馆教育的知识，“这是关系中国图书馆前途的事情，也是关系中国教育前途的事情”。李大钊身体力行，在1920年暑期承担了北京高等师范举办的图书馆讲习会“图书馆教育”课程的讲授工作。这是我国图书馆界首次举办的讲习班，在我国图书馆教育事业中具有开拓性和示范效应。

加强图书馆制度建设

李大钊在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期间，全面系统地改革和整顿图书馆管理制度，对北大图书馆的发展和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李大钊吸纳和参照当时发达国家的理念与治理模式，倡议和推动了北大图书委员会的成立。委员会既是咨询机构，又是决策机构，这使北大图书馆的发展有了权威性的学术决策保障。书刊的订购是图书馆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北大书刊订购都要先提交给图书委员会审查，通过后才能购买。这避免了图书馆书刊订购的盲目性，逐步建立起高质量和适用的藏书保障体系。

李大钊非常明确，收集、管理和提供好书刊是图书馆工作的根本。他主张各类图书兼容、中外文化并存，为此，以“杜威十进分类法”为基础建立了西文新式卡片目录，中文图书虽仍按经史子集分类，但增设了地

理、丛书、类书、科学几类。编出书名、著者、类别三种卡片目录，形成多种检索途径，方便了读者借阅。李大钊认为旧图书馆采用文库式，取书的手续非常麻烦，因此提倡开架阅览，应该“节省无谓的手续和虚费的时间，并且给阅览的人一种选择的便利”。

李大钊用两年多时间，参照国外管理经验，拟定了《国立北京大学总务处图书部试行条例》，体现了很高的管理水平，是我国现代图书馆史上的重要文献。虽然北大图书馆在1906年就制定过《借书规则》和《阅览规则》等章程，但一直未能认真实行。李大钊上任后拟定了《修正图书馆借书规则》，提出以“为谋大多数人阅览便利”为目的，限期还书，加快图书流通，提高图书利用率；规定贵重和稀有的书籍，“仅得在馆阅览”，既利保存，又方便读者，并将借阅规则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公布。这样，借阅制度逐渐完善，有效提高了北大图书馆图书的利用和周转率。

在李大钊的推动下，北京大学还调整了图书馆的组织结构：“图书部加请西文图书主任，中文图书主任，古物美术品主任各一人，辅助图书馆主任，分管各该管事务。”其中西文图书主任由图书部主任兼之，从而构建了北大图书馆三大模块式的组织建制，这种适合北大特点、具有北大特色的

组织结构，为北大的教学科研提供了文献服务的保证。在李大钊的努力下，北大图书馆的馆藏结构、管理与服务方式都有了很大变化，成为一所当时全国居于领先地位的、有重要影响的现代大学图书馆。

不断拓展图书馆功能

李大钊十分注意听取读者的意见，出任图书馆主任不久，便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登出布告：“望同学诸君检查之际遇有不合，随时指告，必需力求改善。”希望从大家的意见中吸取有益的东西，以便改进图书馆业务工作。1918年顾颉刚写了《上北京大学图书馆书》，对图书馆的目录建设、丛书目录排列、图书借阅、取书方法等提出了中肯而尖锐的意见，并提出了许多改进的建议。李大钊对这一意见书十分重视，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改进，获得了校内教职员工的肯定与赞赏。刘半农说：“我的朋友李守常先生，自从做了图书馆主任以来，没有一天不是很诚恳、很刻苦的想法改良。”

李大钊认识到古代图书馆与现代图书馆的性质完全不同，认为现代大学图书馆要服务好教师的研究教学，为学生学习提供好辅助性书刊参考，首先要成为“研究室”，因为只有研究、了解了学术，才能发挥出各种书

刊的最大效用。要把图书馆变为研究室，还必须加强和改善全体图书馆工作人员的素质和知识结构。李大钊认为，如果职员天天办的都是些借书的手续，那么这个图书馆就不是研究室，变成借书所了。他首次在图书馆中聘用文化层次较高的“助教式”工作人员，“一层可以消除师生间的隔阂，一层可以鼓励研究的兴趣”。

李大钊非常注意发挥图书馆在研究和传播先进文化中的优势。1920年3月，李大钊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大图书馆内设“亢慕义斋”（“亢慕义”是英文共产主义的中文译音），藏有中英文的马列主要著作60余种。正是在他的主持下，北大图书馆成为当时中国一个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许多进步青年都把北大图书馆作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课堂，来这里听李大钊介绍新的思想，在他的指导下共同研究、探讨马克思主义。图书馆成为先进文化的传播阵地，这是中国图书馆事业史上的划时代转变。

总之，李大钊所学专业虽然不是图书馆学，但受聘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后，他以图书馆实际工作者和管理者的身份，通过学习研究相关专业知识、革新北大图书馆的管理服务、发表图书馆学演说、讲授图书馆教育等方式，对图书馆学理论与图书馆专业人才的培养进行了较早的系统探索。他还积极推动了中国图书馆界的一个协会组织——北京图书馆协会的成立，并当选为中文书记，与职业图书馆学家们一起推动了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的转型发展，也为中国现代图书馆学的转型和制度建设树立了成功的样板。

